# 情报理论探索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 王延飞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目的/意义]不确定性是情报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对不确定性的情报研究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议题。[方法/过程]阐述针对不确定性的情报理论探索中必须解决的几个情报认知基本问题，包括：情报基本概念、情报任务场景、情报评估诉求、情报分析方法、情报理论研究、情报体系能力和情报学科建设。[结果/结论]提出情报工作者针对不确定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规范做法应当是“破除称谓困扰，兼顾发展安全，立足资源整序，重视感知刻画，突出线索发现，强化体系能力”。

关键词：情报研究 不确定性 情报感知 复杂信息环境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20.005



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情报理论与实践正经受考验，在历练中发展演进。在演进过程中，复杂信息环境使得情报对象和情报议题所呈现的不确定性愈加活跃，情报科学读书会于 2019 年 9 月通过年度主题倡议将情报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聚焦于“不确定性”[1]。2022 年 6 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赵志耘研究员等奋斗在国家科技情报一线的专家提出了复杂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凸显了基于情报任务场景进行理论探索的重要性[2]。

情报理论研究基于对专业认知的正确把握，理论研究成果通过与情报业务和情报学术研究相关的制度、流程和方法予以落实。因此，要想开展复杂信息环境下针对不确定性的情报理论探索，首先必须解决专业认知的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会激发情报业务管理者和情报事业建设者产生浓厚兴趣并能引发热烈讨论，影响着专业发展的走向。情报理论探索中常见的基本问题有：情报基本概念、情报任务场景、情报评估诉求、情报分析方法、探索研究把握、情报体系能力和情报学科建设等。

## 1 理解情报基本概念

情报的宗旨是要解决决策过程中信息不完备的问题。导致决策信息不完备的具体问题的原因表象各异：既可能是信息难获取，也可能是信息不可得，还可能是信息被曲解。情报响应的任务要求因此形式多样：有的任务要求着眼于自身资源基础建设，营造流畅便捷的检索传递渠道；有的任务要求破除屏障，运用各种可用手段攫取所需信息；还有的任务则要求基于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洞悉感知的分析研究。任务情境不同，承担任务的履职主体目标侧重和组织关系亦各有所属，各类主体自然会对“情报”“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等术语作出自己的概念解读。因此，“军事情报”“科技情报”“公安情报”“安全情报”等术语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特定的术语在不同决策关切视阈和任务语境中也有消除歧义、便捷操作的必要性。

尽管任务场景不同、条件方法有别，但限定词各异的情报工作在核心宗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以文字、数据、音像或实物等形式提供参考资料，展示印证观点，实现对特定领导或机关的决策信息保障。所以，从普遍意义上说，决策信息需求、信息载体和流通渠道是各个领域、各种类型情报工作关注和操作的共通之处，当下所议“情报融合”亦可由此觅到认知发端。

对“情报”（intelligence）与“信息”（information）这两个术语概念的认知纠葛，常常在学界造成理解混乱，这往往是由于情报认知与情报实践的脱节所致。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万宗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给出一个“情报”的定义：“情报是推动用户当前事业的信息选择传递。”并对其进行阐释，即“这一表述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情报刻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1BTQ009）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延飞，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yfwang@pku.edu.cn。
收稿日期：2022-07-29 修回日期：2022-08-26 本文起止页码：45-49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有目的、有时机、有行动、有内容对象。'情报'蕴含的行为含义反映一种社会现象,知识反映不了情报概念的本质属性(没有物质不会有运输,但作为运输对象的物质反映不了运输的实质意义)。"[3] 原国防科技信息中心主任史秉能于 2000 年重提钱学森同志的论断"情报是解决特定问题(如产生方案、进行决策、实施行动、制定计划)所需要的知识和情况。情报的产生来源于资料和信息,但资料和信息不是情报,而是产生情报的基础,情报还必须有一个激活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的分析、判断和综合过程,使之成为解决特定问题需要的知识和情况。"[4] 上述两个概念表达从形式上似有所不同,但若将其放在情报工作的任务场景下,至今仍能得到坚实的实践支持。

从情报宗旨出发可以看出,情报学所探究的情报,是特定的、服务于决策的、解决管理决策中信息不完备问题的、经过分析加工和抽象提炼的"特殊信息",情报素材和情报产品均可以信息的形式呈现,情报工作可被视为特殊的信息工作,因而在学术或实践交流中使用"信息"一词来表述"情报",是可以理解的做法。调查发现,国际上如日、韩等也是在不造成认知混乱的前提下,根据使用环境灵活使用这些术语[5]。至于密与非密等安全关切所限定的只是任务条件边界,反映的是情报的效用属性,而不是情报的内涵本质。

## 2 知悉情报任务场景

情报任务场景是对特殊信息环境条件下组织完成特定类型任务的情报工作情景的刻画和描述。

现代情报工作所处的信息环境堪称复杂,复杂性可以用"源多""媒众""形杂""时移""衍丰""雾浓""识专"等标识词来进行表征。源多、媒众和形杂是指情报工作环境中信息的渠道丰富、载体充盈、格式多样。时移和衍丰则特指对信息的内容和效用的解读需要注意把握特定的时空内涵。雾浓是指需要重视由真伪信息交织而成的信息迷雾对分析决策的强烈干扰。识专强调了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加持对信息分析和处理的重要性。

在既有信息资源掌控条件和情报需求的共同决定之下,情报机构和情报工作者可以组织完成的情报任务有 4 种:信息服务、信息共享、情报响应和情报感知。

信息服务是指情报任务主体通过信息查询、信息检索、信息处理等技术手段,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资源去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信息共享是指情报任务主体在相关的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下,利用其他同行主体所掌控的资源,通过共享操作来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

情报响应是指情报任务主体在所需信息资源储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运用情报工作流程手段针对欠缺的信息资料进行搜采和分析研究,并以所得的情报产品去回应领导机关提出的任务要求。

情报感知是情报任务主体对于未知或知之不详情报问题的处理,具体而言是指"情报专业人员在常规性信息采集、加工和分析处理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工具完成对情报用户需求、情报对象内容和情报任务组织的认知、解读和表达"[6]。情报感知所针对的问题通常没有前例可循,难以直接通过简单的分析技术推导出结果,往往具有前瞻性、复杂性、战略性或风险性。

情报任务的发生与情报用户的需求和关切不无关系。无论采用何种任务形式去响应情报用户提出的要求,情报任务主体都是在帮助用户对于特定的决策关注对象进行了解,以消除认知盲区和减少判断意外。复杂信息环境条件下所发生的情报任务场景蕴含着丰富的进行现代情报理论探索的研究线索。

## 3 厘清情报评估诉求

情报评估是情报工作里最常进行的分析行为,评估的对象既可以是情报素材或情报产品,也可以是情报事业、情报机构或情报工作自身。分析人员在评估实施过程中常常会进行"价值"度量,因而"情报价值"也就成为专业交流活动中司空见惯的一个术语。情报任务语境下的情报价值反映的是人们对于情报内容或情报工作的赋能感知评价结果,情报赋能实际上是在改善或提升情报用户的决策能力,是在帮助用户减少对于决策领域事态发展预期判断的认知意外。对情报价值的衡量,既不是计算经济收益指标,也不是点算信息容量,更不能统计所谓情报产品的投送获批次数。

情报分析宗旨和情报任务目标的要求决定了情报工作中评估标准的确立应该围绕着"早醒远眺"的情报特色使命,对"未知"问题进行感知探索和对不确定性未来揭示预警从而减少"意外"才是情报工作真正的价值所在。情报价值实现的条件理当成为情报评估的标准内容。对情报素材或情报产品而言,"准""快""灵"诉求共同构建起相应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情报事业或业务而言,"资源谱系的广度、扫描监测的频度、洞悉感知的力度以及刻画响应的适度"则是评价标准的构成组分。因此,情报评估应该尽量避免采用简单、机械、形式主义的做法,应该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鼓励遵循"操

作流程规范而分析研判开放”的情报工作规律。

## 4 解析情报研究方法

情报研究方法在情报任务管理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是情报任务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好的情报产品所透射出的分析技巧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科技情报专家结合国情行业特点设计出独到的数据处理方法,解决了不同来源型号装备数据不可比的分析问题,为装备科技战略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持,也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研究分析案例。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条件的变化,使得情报界对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手段的重视从未放松,欧美等通过高效智能算法对颠覆性技术进行线索发现感知探测,奠定了算法战理念的生成基础,也反映出情报研究方法探索在科技博弈战场上的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对方法工具的设计与选择对于解决具体情报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情报工作者有时会把解决问题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对方法工具的发掘上,期望能够找到某种普适性的算法模型来解决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问题。然而情报实践的历史一再证明,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选取与设计取决于任务需求、数据基础和分析主体的专业技能等诸多条件,情报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开发与使用不能脱离特定情报工作场景,受特定情报任务要求、特定情报数据基础和特定分析主体主观能力条件的限制。在涉及情报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取用时应该持有的基本观点是:不可奢求拥有范式固定、包打天下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如同情报工作只能在解决信息不完备的问题上作出一定贡献一样,特定情报分析方法和工具也只能是在特定场合处理特定的问题。基于工作任务场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情报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尽管发展与变化是情报永恒的存在范式,但是在情报研究领域依然存在一些诸如地平线扫描、系统分析、盲点分析、排查分析等相对稳定的习惯性做法,成为情报研究分析规范的基本组成,此类规范性方法的使用往往与情报任务分解(工作流程)和分析质量控制相关。例如,地平线扫描在稳健牢固的信息资源保障基础上,通过“全谱扫描、极致感知”的组合操作实现对新兴或颠覆性前沿科技的识别、发现和评估,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坚持使用地平线扫描方法有效支持了现代科技发展战略的决策[7]。系统分析兼顾动静、深究机理,着眼于要素、关联、影响和环境,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的综合性战略性情报研究。盲点分析和排查分析(按照外文直译亦被称为“竞争性假设分析”)是在情报分析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而来,通过工作流程和任务控制的制度化手段来克服情报分析机构和人员天然存在的知识和认知误区缺陷[8]。运用确定的制度化手段去应对解决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是情报研究规范性方法的共同靓点。

## 5 把握情报理论研究

情报理论源于情报实践,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理论成果既是对情报工作规律、规则、方法工具和情报对象认知的梳理、总结和升华,也为后续情报业务开展和事业规制建设提供了分析参考依据。古今中外情报从业者常有著述立说之举。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孙子兵法・用间篇》等作品的解读已毋庸赘言,我国情报研究教育机构所使用的经典教材亦不乏顶级专家执笔编纂,国外情报专家在情报理论探索方面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各种类型的情报机构均有著述交流分享机制,情报专家与情报学者常常身份相兼,经验、教训、心得、技术、方法、理念会被成系统、成体系、分门别类地记录和展现于情报学术承载平台上。

情报理论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于对既有实践的归纳与总结,更重要的是理论研究能够磨砺情报从业者的专业智慧,帮助进行面向未来的专业和事业规划与设计。情报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情报业务实践的活跃总是伴随着情报学术理论研究的勃兴,两者互为促进或制约的关键因素。

开展情报理论研究需要注意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是脱离情报实际的“创新”追求;二是急功近利的跟风短视。

创新是科研人员的共同追求,在情报理论研究的探索中如果忽视情报宗旨去一味追求所谓的创新,将对国际化视野的要求庸俗理解为进行形式上的所谓国际接轨或国际化,则会步入脱离实际的“创新”误区,使得理论研究尽管在输出形式上能够花样翻新,然而在对实践发展内在本质的解析上却疏于考究,难以对情报实践切实起到引领、规划和管理的恒定保障的作用。近年来在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型智库建设落实相关的情报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争议现象凸显了非务实理论“创新”所导致的认知盲点,诸如“以信息之名行情报之实”的实践通行做法在理论研究领域竟然难以寻得映射默契,在改革实践中,情报业务和情报机构的

长处非但没有被重视发挥,固有的资源优势、工作优势和人才优势反而被曲解和削弱,对中国特色情报事业的发展探索殊为不利,在创新探索中要求理论务实的呼声日渐突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信息环境,情报工作条件和业务内容都会有所调整和反映,情报理论研究的关注对象和素材提取有极大的可选择余地,情报理论研究者反而容易迷失在丰富多彩的信息世界里,受新技术和新舆论的影响,过度强调对"新"事物的快速响应,热衷于对新出现的术语、技术的引用、移植和嫁接,难以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定力,"大数据"等操作性术语被炒作成为学术概念即为典型代表,"某某"情报(学)遍地开花的现象折射出学术理论研究正面临流于表面、失于浅薄的风险。

## 6 提升情报体系能力

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实现实质是体系对抗与合作的结果,相关的问题需要从综合战略层面去考虑,应对解决此类问题最终考校的是体系能力。美军早在2004年即将"体系"理念引进到武器装备采办领域,定义了术语SoS(System(s) of System),将任务导向的专用系统资源和能力以虚拟、协作或指导等协调方式集成起来,创建形成更为复杂并具有独特能力的系统集合或系统布局。情报体系能力的形成与运用亦循同理[9]。

情报体系能力构成与运用的基础要件,既包括情报机构或情报专业工作者的个体情报能力,也包括情报治理的规制。进行情报体系能力研究,应该具有动态观、系统观和生态观。

进行情报体系能力的塑造与提升需要处理好"战"与"学"的融合问题以及"道"与"术"的驾驭问题。

所谓"战"与"学"的融合问题反映的是情报能力养成的特殊要求,情报能力的养成,既需要借鉴学习前人已有的经验,更要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自觉意识。美军在所有的任务行动之后都要进行的行动总结制度AAR(After Action Review)对于情报工作者通过实践提升专业认知和分析能力具有很好的借鉴启示意义。对我国专业情报机构的数据调查结果也显示,在日常管理工作中重视进行情报学术研究、重视开展情报学术成果考评的机构,常常能够更好地进行情报任务响应,并表现出较强的任务调整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10]。

所谓"道"与"术"的驾驭问题反映的则是对方法论的理解和应用技巧。在对情报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中,人们往往比较重视对具体方法工具的学习使用,然而在实际的情报问题应对当中,如何选择以及如何组合甚至改造这些方法工具却更为关键,"明道而驭术"是对情报工作者的共同要求。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原则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术"指的则是具体的手段和操作步骤。以科技项目路径研究问题为例:"明道"就是了解路径问题的研究域必须包括发展目标、关键节点和评判标准;"驭术"则要按照目标性问题、节点性问题和标准性问题固有的属性特点要求和既有数据与对象规律情况选取使用特定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斗争形势越是严峻,信息手段越是丰富,对情报体系能力的建设要求也就越是迫切。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背景下,蕴含于"扫描筑基、感知引领、关联论证、刻画呈现、响应监测"等专业操作中的线索发现能力,将会是现代情报体系能力建设中的重要成分。

## 7 规划情报学科建设

情报学科建设是情报学术活动的存在基础和表现形式,对情报学科建设的定位应避免追求将本学科打造成为无所不能的"万事通"或万金油。通常谈论的对情报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T"型知识结构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采用情报专业技能去挖掘、发现和利用各个领域的专业判断,因为通常遇到的涉及具体专业领域的问题并非使用情报专业方法直接解决,而是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运用专门知识技能进行分析处理。正是由于通过发挥情报业务专长可以更便捷地发现和识别值得深究的线索,才使得情报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虽然不能"无事不晓",但有能力做到"知事可期"或"遇事能知"。因而情报学科建设需要锚定情报根本宗旨,本着提升体系情报能力、减少和防范决策认知意外、支持对战略管理预警导航的目的,以资源、技术、制度和队伍为抓手,突出线索发现的情报专业特长,着力进行关于情报事业、情报业务和情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情报学科建设因应国家发展任务和形势环境的变化,革新调整与综合平衡矛盾的出现是一种常态,有关情报学科建设的各种观点亦见仁见智。随着整体国家安全观渐入人心、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相继出台,给情报打上"秘密"的标签、将情报学科建设纳入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建设的呼声渐起,这些都为情报学科建设增添了自我审视动力和参考借鉴对象,激励情报学者在研究中认真区分操作概念和学术概念、推敲"'兼顾'或'统筹'发展与安全"和"'面向'发展与安全"的

定位差异,提醒学科规划管理者重视学科生态,力求营造出良性生长的情报学科生态,使得其中的要素能够共生、共存和共进,能够通过自组织、自生长、自适应和自修正的机制进行功能构建和强化。学科生态要素既包括各项情报任务的目标、过程和方法,也包括情报机构、人员、教育和规制,能够良性生长的情报学科需要经得起"坚守初心、敏锐感知、持续积累"的标准衡量,整体表现应该是谱系资源保障完备、专业机构协同有力、学术成果交流活跃、研究队伍分布有序。

在进行情报学科建设规划的相关分析时需要注意,学科的存续有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交织着客观的学理逻辑和主观的干预意志,人为干预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从短期看立竿见影,从长期看更是根深蒂固。若是主观干预同学科发展的学理逻辑相合,则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学科地位自然了的;若是主观干预同学科发展的学理逻辑相悖或相互偏离,则学科建设难免产出浮夸,学科地位也会尴尬莫名。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使得情报学术研究极易受机构设置的影响,部门或领域情报学产生的原因即在于此。在全局观和历史观缺位的情况下,情报学科在部门或领域情报学基础上的发展失于协调,各部门或领域情报学者在学科交流平台中的话语权亦会失衡,这样既不符合国家情报体系能力建设的要求,也会影响情报学科的健康发展。

## 8 结语

我国科技情报学的发展历史上经历过由"情报"或"信息"冠名所引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纠结,对其进行反思,于当下所进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和业务布局调整尤为有益。"破除称谓困扰,兼顾发展安全,立足资源整序,重视感知刻画,突出线索发现,强化体系能力"是科技情报工作者针对不确定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正确做法,也是其他专门领域的情报研究工作者分享共勉的选项。

**参考文献:**

[1] 赵柯然.温故知新——第50次情报科学读书会顺利举办[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12):179.
[2] 赵志耘,曾文.复杂信息环境下科技情报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研究[J].情报学报,2022,41(6):549-557.
[3] 王万宗.情报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
[4] 史秉能.情报研究骨干业务培训班(讲义汇编)[M].北京: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2000:1-6.
[5] 赖纪瑶,严心月,邓灵敏,等.中日韩"情报"概念认知比较[J].情报杂志,2018,37(4):1-5.
[6] 王延飞,杜元清.情报感知论[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1-4.
[7] 杜元清.地平线扫描的概念及案例研究[M]//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情报学进展(第十二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8:154-191.
[8] HEUER R J Jr.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M]. VA Reston:Pherson Associates,2007:30-70.
[9] 赵柯然.国家科技情报治理中的体系能力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9:45-46.
[10] 赵柯然,王延飞.情报情报机构的能力感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12):36-42.



## Several Basic Issues in Studies of Information Theory

Wang Yanfe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certainty is the main problem faced by information work, and the studies of information deal with uncertainty are the basic topics of infor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on several basic issues in information cognition that must be solved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theory aimed at uncertainty, including: basic concepts of information, scenarios of information tasks, requirements of information assessment, methods of information analysis, theory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ult/Conclusio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normative approach for information worker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uncertainties should be not to be restricted by titles, to take account of both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o be based on resources ordering, to emphasize awareness and description, to highlight clue discovery, and to strengthen system capabilities.

Keywords: information research uncertainty information awareness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